

成都考古研究

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成都考古研究

(一)

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 57 篇，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有代表性论文的一部分。时代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涉及地域主要是四川盆地，少数文章也涉及峡江、川西高原及云贵地区，其中大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少数文章没有发表过。该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年所作过的考古工作与研究状况。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考古研究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3-023831-3

I. 成… II. 成… III. 文物—考古—四川省—文集 IV. K872.7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876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李奕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6

印数：1—1 600 字数：1 310 000

定价：36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上 册

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江章华 王 毅 张 擎	(1)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	江章华	(23)
大渡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陈 剑	(35)
四川盆地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的初步观察	何锟宇	(53)
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江章华 王 毅 张 擎	(63)
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	王 毅 孙 华	(88)
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	蒋 成 李明斌	(106)
峡江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初步研究	李明斌	(128)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	江章华	(137)
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	陈 剑	(146)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	江章华	(159)
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环境与生业初析	陈 剑 何锟宇	(167)
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陈 剑	(181)
浅议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周志清	(197)
浅析安宁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周志清	(214)
三星堆文化研究	王 毅 张 擎	(224)
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	江章华	(237)
羊子山土台再考	李明斌	(246)
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考辨	李明斌	(256)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朱章义 张 擎 王 方	(263)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研究	王 方	(275)
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作品的几点认识	王 方	(285)
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	李明斌	(300)
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初析	颜劲松	(315)
巴蜀柳叶形剑研究	江章华	(326)
战国时期古蜀社会的变迁——从墓葬分析入手	江章华	(335)

下 册

试论四川地区战国墓中的青铜工具	黄晓枫	(347)
四川雅安沙溪遗址陶器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李明斌	(359)
渝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江章华	(368)
试论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兼谈早期巴文化	江章华	(395)
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	江章华	(404)
成都市郫县外南战国秦汉墓地分析	颜劲松	(418)
西南夷地区A型曲柄短剑的功能、使用方式及命名	苏 奎	(428)
滇东与黔西早期青铜时代的居民	周志清	(435)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族群刍议	周志清	(449)
浅析云南元江流域的青铜文化	周志清	(462)
浅析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葬	周志清	(477)
破镜考	索德浩	(483)
邛崃文管所藏“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研究	苏 奎	(494)
关于北周文王碑的几个问题	荣远大	(503)
成都唐代爨守忠墓志考释	荣远大	(511)
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	刘雨茂 朱章义	(515)
青羊宫窑初探	刘雨茂	(528)
论成都唐宋罗城1、2号门址	蒋 成	(536)
唐宋时期四川馒头窑及其装烧技术的探讨	颜劲松	(542)
成都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陶俑服饰研究	颜劲松	(555)
试论四川宋墓	陈云洪	(571)
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	谢 涛	(584)
成都考古发现北宋诗人宋京家族墓	荣远大 刘雨茂	(604)
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	雷玉华	(621)
四川摩崖石刻中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	雷玉华	(649)
四川菩提瑞像研究	雷玉华 王剑平	(655)
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王剑平 雷玉华	(668)
略论成都周边宋墓中的龙形俑	易 立	(676)
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发现与探索	陈 剑	(680)
关于细石器技法起源的一点看法——以楔形石核的时空分布为中心	何锟宇	(704)
浅论中国家马的起源	何锟宇	(714)

试论四川地区战国墓中的青铜工具

黄晓枫

四川地区战国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是巴蜀风格的容器与兵器。此外，在这些墓葬中普遍随葬青铜工具的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四川地区的战国墓葬中一般均有青铜工具出土（详见表一）^[1]。即使不出青铜工具，也会出土一些铁质工具。如大邑五龙乡土坑墓就出土有铁斧、铁环首刀等^[2]。四川地区战国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种类丰富。现根据已有资料，对战国时期四川地区青铜工具的型式演变、年代分期、功用及相关问题谈一点初步认识，以求正于各位同仁。

一、青铜工具的型式

四川地区的战国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主要有斧、斤、凿、锯、斲（原报告多称为“刻刀”或“雕刀”）、锥刀、削、环首刀等。

斧 可分三型。

A型 斧身与銎部有明显分界，斧身銎以下至刃渐宽。可分二式。

I式：42件。弧刃特宽，斧身两侧呈内弧线，大方銎口或矩形銎口，銎上多饰曲尺纹，有的斧身上部有巴蜀符号（图一，1）。

II式：3件。弧刃较I式稍窄，斧身两侧线条较直，方銎口或矩形銎口，銎部饰曲尺纹或条纹（图一，2）。

B型 斧身与銎部无明显分界线，弧刃。可分三式。

I式：9件。斧身上部较宽，基本不束腰，刃部撇开，刃口微弧，长方形銎口，长度多为11厘米~17厘米（图一，3）。

II式：3件。斧身较宽，中部束腰，弧刃弧度较大，圆角长方形銎口或扁圆形銎口，长11.4厘米~12.2厘米（图一，4）。

III式：2件。斧身中部束腰较细，呈两头大中间细，弧刃刃角上翘，长方形銎口，銎上饰曲尺纹，长13.8厘米~14厘米（图一，5）。

C型：形体较小，斧身短而较宽，銎部与斧身无分界。仅彭县致和乡出土1件，六边形銎口，弧刃，长6厘米，刃宽3厘米（图一，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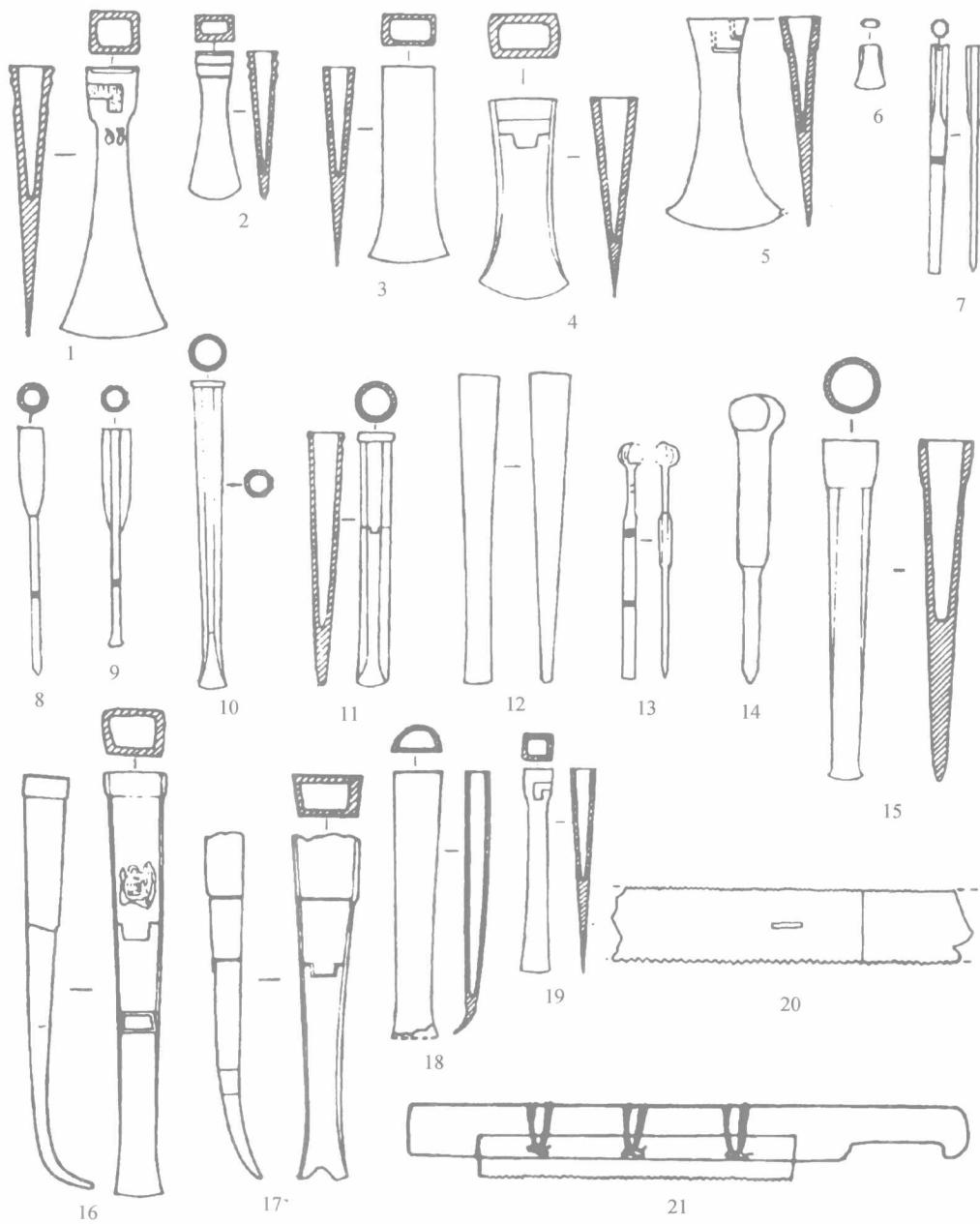
表一 四川地区战国墓葬出土青铜工具一览表

墓葬时代	墓葬出土地点	器物名称	斧			斤			凿			锯			锥刀			削			环首刀			资料出处				
			A型B型			C型			A型			B型			C型			A型			B型			《文物》1989年2期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E型	I	II	III				
战国早期	成都京川饭店		1	1	2				1																			
	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					1																						
	芦山县思延乡				1																							
	成都中医学院					2			1	1																		
	成都西郊青羊宫								1	1	1	2																
	成都百花潭中学		2			2			4				2	2				2										
	成都无机校		1			1			1		1	1	1	1				1										
	成都罗家碾		1						1																			
	彭县太平乡					1					1																	
	成都新一村		1																									
战国中期	新都马家乡	5		5	5		5	5	10	10	6	5	4	3	5	10					5	船棺(木椁)		《文物》1981年6期				
	蒲江	M1							1																			
		M2																										
	绵竹清道	3	2		3	4	7		4	1	4	2	2				8	2			2	船棺		《文物》1987年10期				
	成都三桐桥	1																	1				土坑		《文物》1989年5期			
战国晚期	大邑五龙	M4																	1				船棺		《考古》1987年7期			
		M3	1																				木板		同上			
		M2	1		1																		木板		同上			
		M1	1																				木板		同上			
	成都金牛区圣灯乡M1																		1				土坑		《文物》1985年5期			
	崇庆大划乡	1																					土坑		《成都文物》1987年4期			
	成都光荣小区											1	1	1	2	1	1	1	1	1	1		木板		《成都文物》1990年3期			

续表

墓葬时代	器物类型	器物名称	斧			斤			凿			锯			锥刀			削			墓葬形式	资料出处		
			A型	B型	C型	A型	B型	C型	I	II	III	I	II	III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I	II	III		
战国晚期	荣经烈太乡 荣经同心村 1980年涪陵 1980年犍为金井乡 1980年犍为金井 1977年犍为五联M1、6、7 成都红牌楼M1 彭县致和乡	荣经烈太乡																					土坑	《考古》1984年7期
		荣经同心村	M1	1																			土坑	《考古》1988年1期
			M2	1																			同上	
			M3	1																			土坑	同上
		1980年涪陵							1														土坑	《考古》1996年7期
		1980年犍为金井乡																					土坑	《考古》1985年1期
		1980年犍为金井	M5	1																			土坑	同上
秦 ~汉初	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 1972年涪陵 1977年犍为五联M5 成都白果林小区 峨嵋符溪	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	2																				土坑	《文物》1990年5期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																					土坑	同上
		1972年涪陵	M3	1																			木板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资料存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1977年犍为五联M5	M1	3																			木板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木板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89年1期
		成都白果林小区							1														木板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90年4期
		峨嵋符溪	24	4	1	1	6												2				木板	《文物》1974年5期

注：“√”表示器物件数不明。



图一 四川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工具

1. A I式斧 (绵竹清道) 2. A II式斧 (犍为金井) 3. B I式斧 (绵竹清道) 4. B II式斧 (犍为金井) 5. B III式斧 (犍为金井)
6. C型斧 (彭县致和) 7. A I式凿 (成都白果林) 8. A II式凿 (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 9. A III式凿 (崇经同心村)
10. B I式凿 (成都中医院) 11. B II式凿 (成都白果林) 12. B IV式凿 (涪陵小田溪) 13. C I式凿 (成都白果林)
14. C II式凿 (涪陵小田溪) 15. B III式凿 (成都新一村) 16. B I式斤 (新都马家乡)
17. B II式斤 (成都光荣小区) 18. C型斤 (彭县太平) 19. A型斤 (成都京川饭店) 20. II式锯 (成都中医院)
21. I式锯 (成都红牌楼)

斤 可分三型。

A型 18件。通体端直，长方形銎，銎部与斤身分界明显，銎口为长方形，銎上多饰曲尺纹、八字纹，有的斤身上饰有巴蜀符号，刃平或微弧，长13厘米~18厘米（图一，19）。

B型 曲头斤，斤身较长，銎口为长方形或梯形。可分二式。

I式：6件。銎口略呈梯形，銎部较短，斤身中部有一折棱，刃略弧，长13.6厘米~27厘米（图一，16）。

II式：2件。长方形或梯形銎口，銎部较长，平刃弯曲，长21厘米左右（图一，17）。

C型 5件。曲头斤，銎口为半圆形，銎部与斤身无明显分界线，斤身较长作半圆柱状，平刃微弯，长7.5厘米~13厘米（图一，18）。

凿 可分三型。

A型 圆銎口或多边形内圆銎口，銎部较长，凿身窄而长，截面为长方形。可分三式。

I式：2件。多边形内圆銎口，正视銎部与凿身等宽，侧视则銎部大于凿身，平刃，长12.6厘米~15.8厘米（图一，7）。

II式：5件。圆形銎口，銎部大而凿身窄小，平刃，长12.6厘米~14厘米（图一，8）。

III式：11件。多边形内圆銎口，銎部大而凿身窄小，弧刃，刃部微外撒，长11.8厘米~15厘米（图一，9）。

B型 椭圆形銎口或圆形銎口，身较长，多为棱柱状，少数为圆柱状，刃宽1.2厘米以上。可分四式。

I式：24件。身作六、八、十、十四棱柱状，圆形或椭圆形銎口，銎部极短，弧刃，刃口微外撒，长12厘米~24厘米（图一，10）。

II式：7件。身作六、八、九棱柱状，圆形銎口，銎部较短，弧刃较平，长13.9厘米~22.5厘米（图一，11）。

III式：1件。身呈六棱柱状，銎部较宽，圆形銎口，弧刃略外撒，长16厘米（图一，15）。

IV式：2件。圆柱状凿身，圆形銎口，刃宽平，长15.1厘米（图一，12）。

C型 无銎，凿上端有銎铃形首。可分二式。

I式：1件。铃形首之下为圆柱柄，凿身上部为八棱实心柱，下部为条形（图一，13）。

II式：2件。铃形首有棱柱状柄，凿身呈扁条形，长14厘米（图一，14）。

锯 可分二式。

I式：15件。单边锯齿，锯片中部有长方形穿（图一，21）。

II式：2件。双边锯齿，锯片中部有长方形穿。其中成都中医学院出土的一件为一边细齿一边粗齿（图一，20）。

锯 可分三式。

I 式：4 件。锋呈三角形，锋尖显尖利，身截面显扁平，仅中部略拱起，正面有脊，边折有棱，长 13.2 厘米（图二，3）。

II 式：13 件。锋呈圆三角形，身微拱，断面呈月牙形，正面有脊，边折有棱，长 15.2 厘米～18.5 厘米，宽 2 厘米～2.6 厘米（图二，4）。

III 式：2 件。锋呈倒“八”字形，身拱起，正面有脊，边折有棱，长 15.2 厘米～17.8 厘米（图二，5）。

锥刀 可分二式。

I 式：4 件。长柄，身作三棱形，长 15 厘米左右（图二，1）。

II 式：3 件。长柄，身为四棱形，长 16.5 厘米左右（图二，2）。

削 可分五型。

A 型 形体宽扁，前刃宽于器身，前刃宽度一般在 5.5 厘米以上，削背较直，长 17 厘米～24 厘米。可分二式。

I 式：10 件。削身较宽，弧形刃，刃端上翘（图二，7）。

II 式：2 件。削身稍窄，斜直刃（图二，8）。

B 型 削身窄长，前刃明显宽于器身，前刃宽 3 厘米左右，削背直，长 16.6 厘米～25 厘米。可分二式。

I 式：15 件。前刃呈弧形，刃端微上翘（图二，6）。

II 式：7 件。前刃斜直（图二，11）。

C 型 细长条身，前刃宽于器身，前刃宽 2 厘米左右，削背挺直，长 25.5 厘米～32 厘米。可分二式。

I 式：1 件。前刃呈弧形（图二，9）。

II 式：3 件。前刃为短的斜直刃，器身特别细长（图二，14）。

D 型 削柄下多接椭圆形环首，柄较细长。可分三式。

I 式：6 件。较短小，通体长度在 20 厘米以下，削身较直且基本等宽（图二，10）。

II 式：24 件。削身细长。向刃部方向弯曲，长 20 厘米～30 厘米（图二，12）。

III 式：5 件。削身狭长，削背较直，柄下多为椭圆形环首，有少数为卷云形环首（图二，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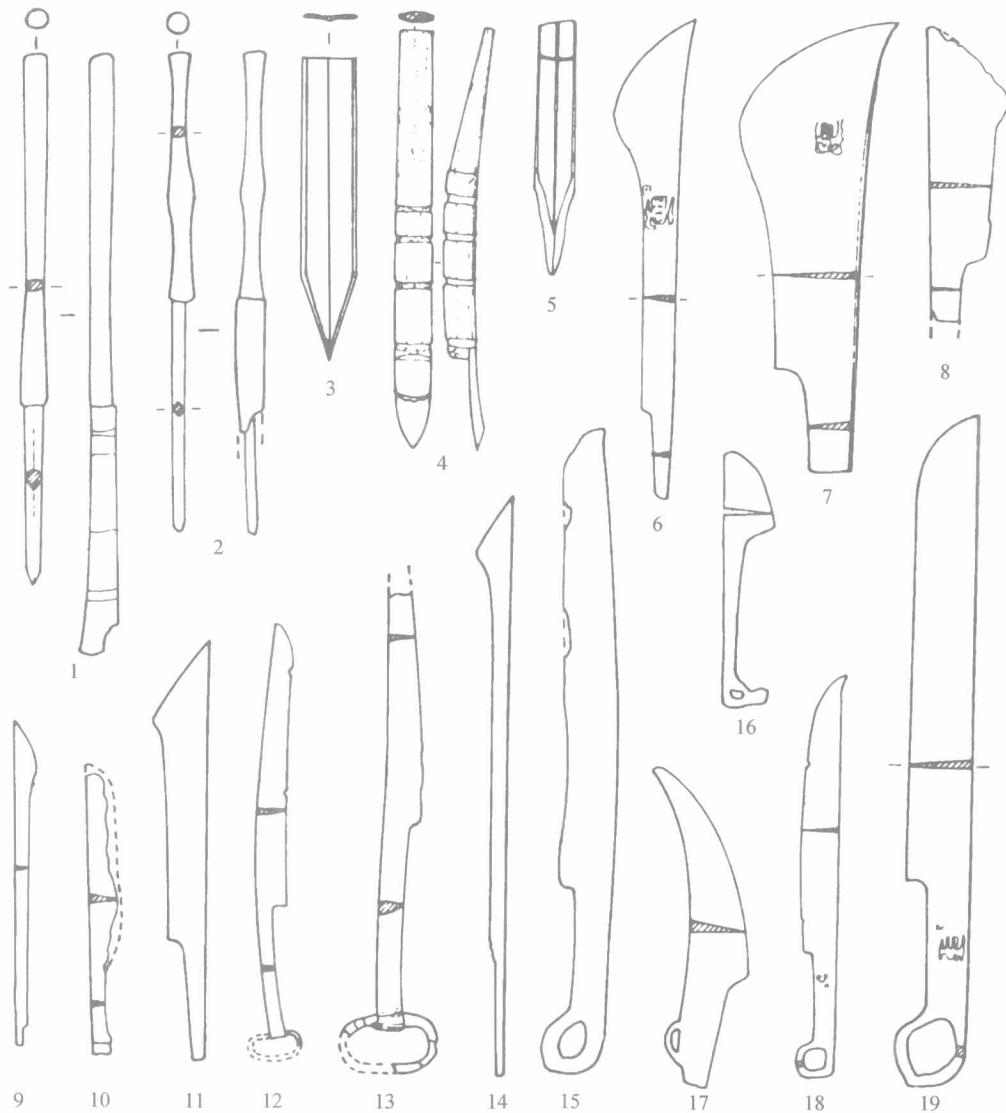
E 型 2 件。异形环首削（图二，16、17）。

环首刀 可分三式。

I 式：6 件。刀身较宽大，刃微弧，直背，锋端微上翘，柄较粗短，椭圆镂空式环首或斜孔式环首（图二，18）。

II 式：9 件。刀身宽大而长，本长度在 30 厘米以上，刀身微向刃部方向弯曲，椭圆形或斜孔式环首（图二，15）。

III 式：6 件。刀身宽大，长且直，柄粗短，斜孔式环首（图二，19）。



图二 四川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工具

1. I式锥刀（左为锥刀，右为竹套；新都马家乡） 2. II式锥刀（新都马家乡） 3. I式撕（成都红牌楼） 4. II式撕（新都马家乡） 5. III式撕（荥经同心村二社） 6. B I式削（新都马家乡） 7. A I式削（新都马家乡） 8. A II式削（绵竹清道） 9. C I式削（成都白果林） 10. D I式削（犍为金井） 11. B II式削（成都百花潭中学） 12. D II式削（绵竹清道） 13. D III式削（荥经烈太） 14. C II式削（成都百花潭中学） 15. II式环首刀（成都无机校） 16. E型削（广元冬笋坝） 17. E型削（昭化宝轮院） 18. I式环首刀（绵竹清道） 19. III式环刀（新都马家乡）

二、青铜工具的年代分期

各型式青铜工具年代的判定依据自然是所出墓葬的年代。据现有资料可知，有共存

关系或年代较为清楚的墓葬可分为战国早期、中期、晚期和秦至汉初几个时期。

战国早期的墓葬有：成都百花潭中学 107 号墓、成都京川饭店土坑墓、成都西郊土坑木板墓、成都无机校土坑墓、成都罗家碾船棺、成都中医学院长沙坡土坑墓、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土坑墓及芦山思延乡土坑墓。

战国中期的墓葬有：新都马家乡木椁墓、蒲江船棺葬、成都新一村土坑墓、彭县太平乡船棺葬。

战国晚期的墓葬有：四川大邑五龙巴蜀墓、四川绵竹船棺葬、成都金牛区圣灯乡 M1、成都三洞桥土坑墓、成都红牌楼 M1、彭县致和乡土坑墓、荥经烈太乡土坑墓、荥经同心村及同心村二社巴蜀墓、犍为金井土坑墓、崇庆大划乡土坑墓、成都光荣小区木板墓、涪陵小田溪土坑墓（1980 年发掘）。

秦至汉初的墓葬有：犍为五联乡土坑墓（1977 年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船棺及土坑墓、成都羊子山 172 号墓、涪陵 M1 及 M3（1972 年发掘）。

峨眉符溪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的层位和共存关系不明，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出土器物明显早晚混杂，推测当不属同一墓葬所出，故在年代分期判定上只作辅助材料。

依据上述墓葬的年代可以看出，战国早期流行的青铜工具有 A I 式斧、A 型斤、A II 式凿和 B I 式凿、B II 式削，B I 式斧、I 式锯、A I 式削、B I 式削及 C II 式削、I 式环首刀也较常见，另外还有 A I 式凿、I 式和 II 式锯、II 式环首刀在少量使用（表二）。

表二 四川地区战国、秦~汉初青铜工具分期表

器名 型 式 时 代	斧				斤			凿			锯		锵		锥刀		削					环首刀				
	A型		B型		C	A	B型	C	A型	B型	C型	I	II	I	II	III	I	II	A型	B型	C型	D型	E	I	II	III
	I	II	I	II	III	型	型	I	II	III	I	II	III	IV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II	
战国早期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秦~汉初																										

注：虚线所在列器物仅出自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或峨眉符溪，其年代尚无法断定，在此也仅作参考。

战国中期，A I 式斧、A 型斤、B I 式凿继续流行，I 式锯、A I 式削、B I 式削开始流行，新出现并流行的青铜工具则有 B I 式斤、C 型斤、A III 式凿、B III 凿、II 式锵、I 式和 II 式锥刀、III 式环首刀，A I 式凿、B II 式削及 C II 式削在战国中期消失。而 B I 式

斧、AⅡ式凿、Ⅱ式锯、I式撕及I式环首刀虽未出现在已发掘的战国中期墓葬中，但它们均在战国晚期墓中存在，所以这些青铜工具在战国中期也可能被使用（见表二）。

战国晚期青铜工具种类较早、中期更丰富。除继续流行AⅠ式斧、BⅠ式斧、A型式斤、C型斤、BⅠ式凿、I式锯、Ⅱ式撕、DⅠ式削、I式环首刀外，AⅡ式凿、Ⅱ式锯、I式撕、AⅠ式削、BⅠ式削、Ⅲ式环首刀也继续沿用，并新出现了AⅡ式斧、BⅡ式斧、BⅢ式斧、C型斧、BⅡ式斤、Ⅲ式撕、AⅡ式削、DⅡ式削、DⅢ式削等青铜工具。在战国晚期基本消失的仅有AⅢ式凿、BⅢ式凿、I式和Ⅱ式锥刀（见表二）。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在战国早期，斧、斤、凿、锯、削、撕、环首刀等青铜工具都已具备，共计15种型式，已相当成熟。由此不难推断，在此之前四川地区的青铜工具已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青铜工具到战国中期进一步发展，共计20种型式。战国晚期则是青铜工具种类最丰富的时期，达26种型式，分布地区也极广。到了秦至汉初，有20种器形已基本消失，仅5种器形沿用下来，新出现的BⅣ式凿、CⅡ式凿、E型削三种器形，不仅数量少，而且仅出现于涪陵及巴县、昭化的墓葬中。

从表二不难看出，除锥刀以外，每种青铜工具都有1~2种器形始终流行于战国早、中、晚期，说明青铜工具在四川地区战国时期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另外，青铜工具的分布虽然广泛，但也有相对集中的地区，即成都地区。在这一区域，又以船棺葬或出现有木制葬具痕、朱漆痕的墓葬所出青铜工具较多。

三、青铜工具的功用及相关问题

四川地区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种类丰富，有斧、斤、凿、锯、撕、环首刀、削及锥刀八大类，可以推知其在功用方面应有较明确的分工。从大的方面来看，可划分为木工工具和制篾工具两大类。

木工工具包括斧、斤、凿和撕。作为解木工具的框架锯在我国出现时代较晚，目前所见完整的框架锯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清明上河图》中，而《营造法式》中的记载方表明这一锯作技术的成熟。在此之前，斧是砍伐和解木的主要工具。以斧开裁木料是沿用楔的开裁方法，这样劈裂而成的木板往往有撕裂痕迹，而斤、撕就是用作平木的工具^[3]。用斤（A型斤）将木板大致砍平，再用撕加以刮削^[4]。平木之后对木材更进一步的加工则是挖槽或穿卯孔，使之最终得以构搭成件，而凿、B型斤、C型斤则是挖槽、穿孔用的工具^[5]。

制篾工具包括有锯、削、环首刀、锥刀等。巴蜀之地多竹，邛竹自古就闻名天下，所以四川地区古代居民对竹的利用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在古籍中难以查找制篾的记载，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如信阳一号楚墓^[6]工具箱中出土的一整套制简工具就为我们勾勒了加工竹条的大致方法和过程：锯断（锯）、削光（环首刀）、剃除茸毛（削）、钻孔（锥刀）。

除加工竹、木之外，青铜工具亦可作其他手工工具。例如平木的斲，在信阳楚墓中显然是作为制简的工具（原报告称为尖刻刀）。从两湖、两广特别是广西银山岭战国墓^[7]出土的74件斲（原称为“刮刀”）看，它亦可加工麻。巴蜀之地向来物产丰富，麻、纻、罽、罽、眊、睂、犀、象^[8]等的加工也未必不用这些手工工具。

青铜工具的用途虽然并非简单化一，但其作为木工工具和制篾工具的主要用途是不容置疑的。巴蜀战国墓葬中大量出土青铜工具是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木本、草本及蕨类植物非常繁茂^[9]，因而人们对木材、竹材及茅草大量而频繁的加工利用是必然的。许多遗址的发掘也表明其建筑多采用木材、竹材。例如1980年至1981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共清理出18座房基，这些建筑遗迹均属地面木构建筑，其中“第二期文化的房址，平面均呈长方形，四周墙基挖槽，并在沟槽中掘洞立木柱，然后再编缀木（竹）棍（条），最后两面涂抹草拌泥而成‘木骨泥墙’……顶似用竹、木构缀，其上再覆盖草的轻型结构”^[10]。而1986年发掘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更清楚、直接地反映了成都地区当时建筑采用的材料及构件的结合方法^[11]。这些木构建筑是用圆木、方木、木板及圆竹、竹篾、茅草等建构而成，大型建筑的地梁基础“先把圆木加工成整齐的长方木，在上面凿出精确的卯孔，以立柱架梁。这些卯孔是用凿一类工具加工而成的”。小型建筑则“在木构件连接处，直接用竹篾绑扎或先凿出较浅的卯口，再用竹篾绑扎牢固”。总之，这一木结构建筑的基础、墙体、房顶均以圆木构件，用较原始的榫卯与绑扎相结合的方法连接成方格网状的骨架，屋内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上，属“干栏式”体系。史书也多有蜀人居“干栏”的记载^[12]。构筑这种“干栏式”房屋，无论是修整方木，穿凿打孔，还是制作竹篾都需要大量的木工和制篾的手工工具。

再者，巴蜀地区河流众多，历来以造船闻名，“蜀艇”在当时与“越舲”齐名^[13]，至汉代蜀地的造船技术已相当精良，规模也相当大：“……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14]如果没有先进的木工工艺及大量的木工工具，造就这样的大船是不可能的。

同时，就巴蜀地区的墓葬材料来看，战国时期盛行船棺葬、木板墓，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区尤其流行独木棺葬，这些棺木的加工同样需要木工工具。

综上所述，正因为商周时期巴蜀地区无论是居址建筑还是日常生活以及葬俗都与加工木材、竹材密切相关，所以随葬品中木工工具和制篾工具的大量出现也就不难解释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四川地区战国墓葬中所出土的青铜工具种类多、数量大，特别是在成都及附近地区更为显著。这些青铜工具无论从数量、形制上还是种类上看都比较成熟，因而，战国时期已是四川地区青铜手工工具发展成熟的阶段了。四川地区春秋及以前的墓葬、遗址等考古资料较欠缺，使我们目前尚难以纵观四川地区青铜工具发生发展的全貌。但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小型磨制石器锛、斧、凿等）及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玉凿、玉斧、玉斤、玉锛等的出土^[15]，又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早在春秋战国以前，手工工具已在这一区域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与周邻文化的关系

战国时期四川周邻文化中与四川地区联系密切的当首数楚文化。特别是到了战国晚期，迫于秦的压力，蜀楚关系更为密切，有人认为或可达到“联盟”的地步^[16]。从江汉地区出土的生产工具看，其种类主要有斧、锛、楔、凿、钻、锥、针、锤、刀、削刀、刮刀（即斲）等，用于砍伐、木工、竹工、缝纫、雕刻和竹简修刮等方面。在这些工具中，尤以锥刀、环首削、斲（亦名刻刀、刮刀）与巴蜀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例如襄阳蔡坡 M4 出土的锥、刮刀^[17]，江陵望山 M1 出土的刮刀、削刀^[18]，以及江陵李家山 M4^[19]、黄州国儿冲 M3^[20]出土的削刀等。其中环首削刀是楚地最为常见的一种小型工具，从春秋至战国晚期，无论遗址还是墓葬中都常见到。与之极为相似的是四川地区战国墓中出土的环首削（本文所述 DⅡ、DⅢ式削）。在四川地区，这种环首削是从战国晚期才开始出现并流行，多见于成都平原及其南部的峨眉、犍为等地，在秦汉时的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墓地也多有出土。这种环首削与四川地区自战国早期即有的环首刀在形制与尺寸上都有明显的区别，环首削应是蜀楚在战国晚期频繁的交往中由楚地传到蜀地的一种手工工具。另外，斲在长江以南的战国墓中出现较多，除四川的新都、成都、荥经，湖北襄阳蔡坡、江陵望山及信阳一号楚墓外，在湖南宁乡、长沙、湘乡、资兴、吉安白鹤湾，江西清江，浙江绍兴，广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和香港、广西平乐银山岭等地均有出土，是一种用途较广（用于加工木、竹、麻等）、分布也极广的手工工具。从年代上而言，以湖南资兴 307 号春秋早期墓、江陵望山 1 号春秋后期墓、长沙龙洞坡 52 号、826 号春秋后期墓等时代较早。四川地区的斲则出现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土坑墓、西郊土坑墓、战国中期的新都木椁墓及战国晚期的成都红牌楼土坑墓、荥经同心村二社巴蜀墓等墓葬中。其中战国晚期的成都光荣小区新村工地木椁墓中所出的 3 件斲，虽形制不同，但均铸有“王”字，字体与望山 1 号墓所出斲（原报告称“刮刀”）上的“王”字如出一辙，由此虽不能断言斲即是从楚地流传入四川地区的，至少能说明楚文化因素在战国晚期对四川地区的影响。而楚文化因素在四川地区战国晚期较为明显、频繁的出现，正好说明两地在这一时期的关系较以前更为密切。

注 释

- [1] 除表中所列墓葬外，在 1986 年成都抚琴小区市建三公司四处基建工地发掘清理的一座战国土坑墓、1987 年青羊小区成都教育学院船棺葬、1974 年芦山青源乡大同村、蒲江城东船棺葬、青川县沙洲地区永红乡都家坝墓地以及 1987 年成都青羊小区乙型十六栋工地发掘的青铜窖藏中，均有青铜工具出土，种类有凿、锯、削、斧及环首刀等，因所发表资料十分简略，故不列入表一。
- [2]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 年 7 期。
- [3] 《释名·释用器》：“斤，谨也。板广不可得削，又有节，则用此斤之，所以详谨令平灭斧迹也。”

- “斲，斲解也，斤有高下之跡，以此斲弥其上而平之也。”
- [4] 孙机：《战国古代的平木具》，《文物》1987年10期。
- [5] 《说文·金部》：“凿，所目穿木也。”段玉裁注：“穿木之器曰凿。”《释名·释用器》：“凿，有所穿凿也。”
-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 [7] 蒋延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2期。
- [8]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土植五谷……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兔、巨犀、山鸡、百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华阳国志·蜀志》“……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釐、犀、象、毡、眊、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
- [9] 罗二虎、陈放、刘智慧：《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
- [1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 [1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 [12] 《魏书·僚传》：“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旧唐书·南平僚》：“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为杆栏”。
- [13] 《淮南子·俶真训》。
- [14] 《史记·张仪列传》。
- [1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 [16] 郭德维：《蜀楚关系新探——从考古发现看楚文化与巴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
- [17]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1期。
-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19]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3期。
- [20] 黄州古墓发掘队：《湖北黄州国儿冲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3期。

（原载《华夏考古》2002年4期）